

# 蒙古族女性头饰文化研究

朱荔丽<sup>1</sup>, 苏日娜<sup>2</sup>

(1.北方工业大学, 北京 100043; 2.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目的** 民族服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蒙古族女性头饰是其中的重要一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出现。对近三十余年蒙古族头饰的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性梳理, 可以掌握其发展进程及研究重点, 进而提炼核心内容, 构建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为相关研究提供方法论及材料内容的参考。**方法** 一是类型比较研究, 从地域邻近文化的趋同性所致头饰造型的相似性角度勾勒出部落头饰的类型样貌。二是整体解读研究, 实现由点及面的研究过程, 保证研究的精准性与全面性。**结论** 对于蒙古族女性头饰外观、材料及审美的研究已告一段落。下一步需要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一方面需要进行田野资料的搜集, 作为文献研究的重要补充, 以提高研究的现实价值; 另一方面需要透过头饰等物质文化的研究来聚焦与之相关的人群, 由物及人, 实现技艺文化的在地化研究。

**关键词:** 蒙古族; 女性; 服饰; 头饰; 综述

**中图分类号:** J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16-0043-08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6.008

## Mongolian Nationality Female Headdress Culture

ZHU Li-li<sup>1</sup>, SU Ri-na<sup>2</sup>

(1.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43, China;

2.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Ethnic minority dr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Mongolian female headdress is one of them. Since the 1980s,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 resul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ave been published. By comprehensive combing of researches related to Mongolian headdress over the nearly 30 years, we can grasp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earch emphases, refine the core content, bui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research methods and materials. The first is the type comparison study, which can outline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clan headdress in terms of the headdress similarity caused by cultural convergence of nearby regions. The second is to interpret the research as a whole, realize the research process from point to surface, and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on the appearance, material and aesthetics of Mongolian female headdress should be finished. The next step is to carry out mor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llect field data as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so as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he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ed people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material culture such as headwear, to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echnology culture from objects to people.

**KEY WORDS:** Mongolian nationality; female; dress; headdress; research summary

头饰, 既是日常之物, 也是仪式之物。它既是商品, 也是礼物。物是围绕在人们身边的一个庞大体系, 通过掌握物的属性, 人类在对象、陈述及概念之间寻找规律, 并对它们进行了一种严格的分类, 使其更好

收稿日期: 2020-07-01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8YTC02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20YJCZH125)

作者简介: 朱荔丽 (1980—), 女, 黑龙江人, 博士, 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传统技艺文化研究、文创产品研究、物质民俗学研究。

地为人所用,这便是“物的知识”<sup>[1]</sup>的形成,事实上也是人类自身话语的形成<sup>[2]</sup>。头部装饰物作为物的一种,是记录民族的历史文化、日常生活、审美习惯的载体,对头饰之物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观察、分析和解释那些不同文化研究领域,从这些私人的、非形式化的,甚至无明显表述意图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是生命经验的另一种隐晦的面貌,直接经验中的思想将会被辨识出来。同时,以女性头饰为主体物展开的研究,是从另一个视角切入,观察人如何在有意无意间赋予物某种意义,再用物的文化意义去解释人的行为以求更精准地确定这些结构的社会基础和涵义<sup>[3]</sup>。蒙古族是重视头饰的民族,从古到今,不戴帽冠不至人前是蒙古人的礼仪之观、待客之道。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习俗逐渐淡化,但在传统文化保存较好的牧区,还是沿袭着这一习俗。本文梳理了蒙古族女性头饰研究的发展历程,并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主题分析,尤其是对国外的相关文献进行了重点介绍,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 1 蒙古族女性头饰的历史分期与部落头饰

蒙古族对于头饰十分重视,相较于男性的发式与帽冠而言,女性的头饰因其造型的复杂与夸张、材料与装饰等备受世人关注,头饰是了解蒙古族习俗、审美乃至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头饰记录了蒙古人的历史。然而作为主流结构之外的民俗物象,女性头饰本身并没有完整的历史记载,也甚少有人通过它去回望蒙古人走过的世界,因此,研究者们从各种史料中摘录、整理头饰的演变过程,将它呈现于其所经历的世界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意义消失了,另一个意义产生了,在意义生成、变换、湮灭的过程中,蒙古族的文化形象愈加明晰起来。

### 1.1 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头饰

蒙古共同体的形成是从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时起,实行千户制,各个部族原有关系被打乱,95%的千户完全是地域的组织。明代及清初,各部落迁徙频繁且距离遥远。蒙古人历史上的迁徙空间十分广泛,尤其是在元代吸收了很多外来人口,这些人员的到来必然将当地的文化、自身的审美带入了蒙古族群中,因此,从蒙古共同体形成至今,其文化、审美、装饰一直在变,呈现多元文化的特征。1856年,哥特费里德·桑佩尔在一次关于人体装饰(Schmuck)功能的讲座上将人类的人体装饰品进行分类,并总结出垂饰、环饰、方向性装饰三大类:垂饰的审美效果取决于地球引力法则;环饰包括所有套在身体上以突出人体美的环形物,如花环、皇冠、腰带和手镯等;方向性装饰突出某一特定的方向,如羽盔或耸起的发型,使人显得高大,与下沉的垂饰不同,这种装饰还可指示穿戴者运动的方向<sup>[4]</sup>。蒙古族女性头饰成型至

今大致经历了方向性装饰—方向性装饰与环饰并存—垂饰与环饰并存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约为蒙古汗国建立,蒙古共同体形成时期,女性头饰以罽罽冠为主,属于典型的方向性装饰。该时期是蒙古人在草原上寻找民族发展方向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蒙古汗国至北元,在此期间,蒙古帝国经历了崛起—盛世—衰落,女性头饰也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发生演变。在蒙古帝国西征欧亚大陆、南伐北宋的时期,女性头上的罽罽冠好似蒙古人的雄心一样,更加高耸,有说“高二尺许”,也有说“约三尺高”;有说“远看像头盔和长矛”,还有说“状似人腿”<sup>[5]</sup>的。到了元代,蒙古人已经控制着当时世界最大的洲际国家,罽罽冠的高度反而有所降低,虽然还是以方向性装饰为主,但其咄咄逼人的气势有所减弱。这个时期环饰大量出现,即女性除了罽罽冠,还有其他帽子可戴,并且帽子的种类多达十几种,不同季节有不同款式、不同材料的帽子可以选择,头饰中环饰种类的大量出现是元代国力提高的表现之一。到了北元,蒙古人退回漠北,这时期的罽罽冠已经相对少见,亨宁·哈士纶认为罽罽冠在喀尔喀蒙古(即今天蒙古国中的喀尔喀部)至少是被戴到了1938年底<sup>[6]</sup>。取而代之的是笠帽与蓆帽,笠帽和蓆帽虽然同属环饰中的帽冠,但是属于保留了一定的方向性装饰,即头顶尖锥状突起。这种帽子造型没有阶级差异,贵族平民均可佩戴,差别体现在镶嵌的珠宝材料上。第三个时期是清代至今,佩戴头饰仍是蒙古族女性的重要生活习惯,不同部落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头饰,除布里亚特是戴帽子,鄂尔多斯的鄂托克、杭锦在垂饰上加帽冠外,绝大部分都是纯垂饰类。然而在这期间,有一段时期的蒙古族女性是无头饰可戴的,只用一块绸布或土布将头发包住,这种包发的形式也可归结为环状。这个阶段的头饰风格基本是受女性审美和财富情况的影响,象征功能发生了转变。

### 1.2 蒙古族部落女性头饰

当下日常语境中的蒙古族部落女性头饰是指从清代形成的各部落特色头饰。清代,蒙古人的帽冠样式依然多种多样,冬有风雪帽、皮帽、圆帽、羊绒帽等;夏有尖顶圆帽、毡帽等。妇女特有的帽子还有耳朵套、凉圆帽。与此同时,女性头饰的种类繁多,察哈尔、鄂尔多斯、乌拉特、茂明安、四子部之妇女头饰华丽名贵,多以珊瑚、金银为之,价值千万<sup>[7]</sup>。从清代发展至今,二十八个部落的女性头饰虽各有千秋,但也有民族共性。从涵化的结果来看,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保持了游牧文化特征的部落女性头饰,如巴尔虎、布里亚特、土尔扈特等;另一类是与外来文化接触较多,并且相互作用的部落女性头饰,如受满族文化影响较多的科尔沁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阿拉善信仰伊斯兰教蒙古部等。地理位置是两类头饰产生差别较多的决定因素

之一。从地域邻近文化的趋同性所致的头饰造型的相似性来看，部落头饰大致可分为“冠”状头饰、“垂”状头饰、“簪”状头饰和“角”状头饰，并且其中三种类型的头饰分别统领内蒙古草原三个区域的头饰风格，如西南隅鄂尔多斯的“冠”状头饰，中部区以乌拉特、察哈尔、苏尼特为首的“垂”状头饰，科尔沁及所在整个东部区的“簪”状头饰。

“冠”状头饰的代表部落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鄂尔多斯部，作为八白帐的守护者，该部落受到蒙古宫廷文化及贵族文化的影响，头饰冠体每个部件之间很紧凑，珠子与珠子紧密排列，链子与链子层层叠叠，构件数量虽多，但毫无散乱之感，将宝石浓重的色彩感发挥得淋漓尽致，且由于这种紧密性所传递出的完整感，塑造了鄂尔多斯头饰的典雅气质。“簪”状头饰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包括有扎赉特、科尔沁、扎鲁特、奈曼、阿鲁科尔沁、敖汉、巴林、翁牛特八个部落，簪钗式头饰实际上也可以称为发饰，因为与发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不像其他头饰那样“盖”在头发上，而是要用专用的发式才能将这些发饰串起来使用。夹在西南隅的鄂尔多斯“冠”状头饰和东部区的“簪”状头饰中间的是“垂”状头饰区，从西向东分别是乌拉特、土默特、达尔罕、茂明安、四子部、察哈尔、苏尼特、镶黄旗、阿巴嘎、克什克腾、乌珠穆沁等部落，这些部落头饰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琳琅璀璨的垂饰，大量珠串垂挂在女性的脸颊和额头周围，像密集的刘海。“角”状头饰是内蒙古东北部地区的巴尔虎部落的代表性头饰，其构件相比较其他部落来说简单许多，仅由五个构件组成，但却营造了最为夸张的视觉效果，体现了动物崇拜下的物象叙事。

## 2 蒙古族女性头饰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1949年前，有关蒙古族头饰研究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1949年以后，与头饰相近的蒙古族服饰研究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服饰研究基本同步，全面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作为学科领域，不断有民族学者、民俗学者、文化学者、艺术研究者及爱好者加入，使得研究成果逐渐丰富。

### 2.1 相关史实判断

从蒙古共同体形成至今，由于文化、审美、装饰一直在变，所以头饰造型的时间断代及文化内涵的变迁研究是蒙古族头饰研究的重要部分。蒙古族头饰研究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多从史学角度对罟罟冠进行了考证。金启琮先生的《故姑考》<sup>[8]</sup>和方龄贵先生的《罟罟考述》<sup>[9]</sup>，对罟罟冠的产生、消亡及其词义作了深入研究，为后学之辈奠定基础。阿满的《蒙族妇女“顾姑”冠文化溯源》<sup>[10]</sup>一文认为“顾姑”冠最初是蒙古族女性婚礼时佩戴的礼冠，进而成为已婚

女性的代表。

进入21世纪，苏日娜于2000年发表了蒙元服饰研究的系列论文《蒙元时期蒙古人的服饰原料》《蒙元时期蒙古人的发式与帽冠》《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与靴子》<sup>[11]</sup>。该研究开启了蒙元服饰系统性研究的方向。随后，苏日娜的《罟罟冠形制考》一文<sup>[5]</sup>在对罟罟冠的词义及渊源梳理基础上，利用13世纪中外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图像资料考据的“二重证据法”，论证了罟罟冠的形制及其演变规律。苏日娜的《蒙元时期的头饰》采用史料记载与考古资料相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蒙元时期的男子发式、女子发式及头饰进行了细致分类和详尽描述，并就发式与帽冠的造型特征、佩戴制度深入分析，指出蒙元时期是一个文化交流与冲突激烈的时代，蒙元时期的头饰折射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这一研究是蒙元时期头饰专门性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作为服饰文化的一支，头饰在文献中的专门性记载却很少，需要从散落民间的资料和出土文物中搜集整理。其中，壁画资料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美岱召作为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建成的喇嘛教传入蒙古的弘法中心，其建筑及壁画资料是蒙藏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金申的《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的蒙古族服饰》是较早详细研究美岱召壁画中头饰情况的文章，他对壁画上佩有蒙古族头饰的人物进行了分类，包括有八位主要人物，五十四位配景人物。对于男性和女性的发式描述极为详尽，并辅以图片说明。将画面中出现的帽冠概括为八种，且不分性别均可佩戴<sup>[12]</sup>。文中所提到的一些观点被后来的学者反复论证或参考借鉴，是了解北元时期蒙古族头饰服饰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这篇文章的分歧主要在于壁画的绘制年代是否能够支撑其作为史料。反对者认为该壁画修补的年代不可考，在修补过程中也许发生了画匠修改画面的情况，导致画面并非是北元生活的真实再现。支持者则认为即便是有后续修缮，也应是在保持原有画面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壁画上的人物形象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以上研究成果对于蒙古族的发式及头饰进行了史实判断，厘清了蒙元时期头饰的基本造型，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专门性研究之外，王瑜编著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服饰》相对而言更为广泛地介绍了蒙古族服饰文化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着重描述了元朝时期的蒙古族服饰文化，对北元及后期的蒙古族服饰也有所介绍。另外，如钟敬文主编的《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及陈高华与史卫民编著的《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都涉及到元代蒙古族服饰特点。该类文章对元及北元时期蒙古族服饰进行了简要描述，为研究提供了基础性认识。徐英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工艺美术史》按历史断代，分别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手工艺品，深入

探讨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敖其的《蒙古族妇女服饰之特征》从蒙古族妇女服饰的形成过程、发展变化的状况、传承革新的轨迹中总结出以下四个鲜明的特征：地域与部族的独特性；年龄身份的区别与婚否的符号特征；崇尚色泽的审美特征；蒙古族妇女服装与饰物的和谐性<sup>[13]</sup>。王冉的《明代中后期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服饰变化论述》介绍了明代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服饰受汉族文化影响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仍保留适合生产生活的具体细节。王远征的《清代昭乌达蒙古族妇女簪钗头饰赏析》从自然因素和历史角度对清代昭乌达蒙古族妇女头饰进行研究，描述了当时头饰的结构构成、佩戴形式、材料审美和文化交流对制作的影响。对文献进行整理后发现，史实判断类研究关注元代的内容居多，对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的记录则较少。对从明代到清代，蒙古族女性头饰从罢罢冠过渡到部落头饰的成因与过程论及甚少。

因地缘、政治等方面原因，俄罗斯重视蒙古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出土文物的分析考证，如前苏联考古学家E·诺夫戈罗德娃的《蒙古的古代艺术》<sup>[14]</sup>、尼雅姆-奥索仁·楚勒特木的《蒙古艺术史(从古代到20世纪初)》，通过文中大量的插图及文后附图，详细地介绍了蒙古艺术风格的形成背景，并着重指出了这些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蒙古草原在数千年间先后出现的民族与国家都在蒙古艺术上留有痕迹<sup>[15]</sup>。从头饰变迁的史实判断研究来看，每一个朝代的更替，改变的并不只有权力与阶级，文化在摧毁与新生中重新展开，头饰跨越时空的流传使其成为叙述者，头饰的生命价值使头饰起到了述说地域民俗、历史记忆的作用。

## 2.2 部落特征研究

当下日常生活语境中的蒙古族部落女性头饰是指从清代形成的部落头饰，女性头饰从清代以前的多款帽冠“并存共戴”发展到清代以来“蒙古风格”共性下的部落个性头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整理来看，国内研究者关注的部落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科尔沁等地区。曹纳木搜集整理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头饰追溯》最初是蒙文版，经赵忠诚翻译后出了汉文版，集合了多篇关于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妇女头饰的相关文章，书中包括有拿木吉乐道尔基的《鄂尔多斯妇女首饰》、曹纳木《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首饰略考》等多篇文章，这本书专注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女性头饰研究，分别从民间传说、风俗习惯、头饰造型、材料质地等角度解读了鄂尔多斯地区多个旗的女性头饰造型与文化，是有较强在地化研究特征的一本著作。苏婷玲的《清代乌拉特蒙古族妇女头饰调查》<sup>[16]</sup>从年龄划分对清代的乌拉特女性头饰进行了调查，对头饰型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包括宝石数量、组合方式等细节，其调查方式值得借鉴。

此外，内蒙古地区高校的多篇硕士论文展开了对于鄂尔多斯地区女性头饰的研究，如杜雪菲的《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传统服饰艺术研究》对鄂尔多斯头饰制作工艺进行了田野调查，同时还与巴尔虎、科尔沁和土尔扈特部进行了比较研究。欧仁图雅《鄂尔多斯妇女头饰研究》则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切入，分析鄂尔多斯妇女头饰造型与蒙古族民间习俗、观念之间的联系，认为头饰艺术不仅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质文化产物，而且以文化载体的形式反映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文化思维与审美变化<sup>[17]</sup>。这些文章根据作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均对鄂尔多斯女性头饰的历史发展，文化内涵及传承保护方面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介绍，还有继续深入的空间。科尔沁地区的研究也是以硕士学位论文为主。例如曹莉的《科尔沁蒙古族服饰当代的变迁与文化价值探析》、明兰的《科尔沁蒙古族服装刺绣习俗探析》等文章就分别从习俗探析和传承保护进行了探讨。

除了对单一部落的研究之外，还有对多个部落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键性观点的重要著作——丹麦玛尔塔·布耶(Martha Boyer)的《Mongol Jewelry》，该文献可以说是蒙古饰品类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因为作者不仅使用了关于游牧文化的民俗学研究方法，而且还掌握了大量国内现在都没有的实物资料。其资料来源是丹麦民族博物馆中的蒙古学资料库，该资料库中90%的藏品来自于亨宁·哈士纶-克里斯滕森(Hennig Haslund-Christensen)的搜集，亨宁·哈士纶参加了1927—1930年斯文·赫定带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后领导了丹麦国家博物馆组织的两次中亚考察队，于1936—1937年到了东北、东蒙古以及布里亚特、科尔沁、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地。1938—1939年与卡尔·格伦维奇、维涅尔、雅柯布森等人一起完成了喀尔喀、阿巴嘎、苏尼特、察哈尔、达尔罕贝勒等近二十个旗的田野考察<sup>[18]</sup>。他大量搜集了从宗教到生活、从仪式到日常的蒙古人生产生活用品，其中包括蒙古族女性服饰、头饰及其他装饰物，这些资料是北欧地区蒙古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sup>[19]</sup>。该书于1952年在丹麦出版，1995年由嘉士伯基金会游牧研究项目支持，Thames and Hudson, R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Art Publishers整理成英文版出版。正文为九章，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内外蒙古十余个部落(Indicates Khalkha、Buryat、Chipchin、Daghur、Khorchin、Kharchin、Abaga、Suni、Chaha、Khalkha Darkhan Beie、Tumet、OrdoS)的头饰进行了描述性调查和分析性研究，也对耳饰、胸饰、腕饰乃至甲饰进行了调查研究并附上大量图片，整体分析了蒙古部落与周边其他政权之间的关系，细节部分探讨了罢罢冠产生传说的来源推测等，甚至研究了女性发胶的制法，全书无论是方法论，还是材料，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 2.3 形制审美研究

蒙古族的图案审美是基于对“圆”图形的想象与表达,当站在草原上的时候,人类感觉作为一个中心点,所有的景物都在向四周扩散,或者是被周围的景物包围,由于草原上前后左右的视觉内容十分相似,所以它并没有呈现出人们想象中平原的平面感,而是形成了具有穹顶感的弧形笼罩式体验。这种圆形感体现在装饰图案上是以一个花纹为中心向四周扩延,到了边缘处,用四组角隅纹将其括住,形成一个完整的画面。无论垂饰有多长,头饰的圆心永远在头顶上,这就要求头饰需要具备另一个特征——对称。蒙古图案永恒的特征是对称,这也是其意义最为深远的民族特征<sup>[17]</sup>。这种独特的身体感受影响到审美上,体现在蒙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对头饰形制审美的研究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与生活体验的探索。苏日娜、李洁的《游牧文明视域下蒙古族服饰的重复审美意识》<sup>[20]</sup>一文从西方重复审美意识角度对蒙古族服饰的图案、色彩、形制三个方面解析了蒙古族服饰的重复审美意识。另一篇服饰审美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是格日勒图的博士论文《游牧文化视野中的蒙古族服饰研究》,在此文中,格日勒图以人类学、民俗学、美术学的研究方法对游牧文化形态下的蒙古族服饰及审美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与道日娜一同发表的《游牧民族女性头饰的审美历史与当代发展》对蒙古族不同地区女性头饰的形式、图案、审美文化进行了概括性阐述。而赵旭东的《侈糜、奢华与支配——围绕十三世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与政治风俗的札记》则是探讨了权力与审美之间的关系,借用奥森的观点,认为金丝织就的纳石失面料是蒙古人对于自己未来的辉煌象征化,甚至成为了一种追求帝国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性的基准目标<sup>[21]</sup>。头饰服饰的政治意义十分明确,帽冠的佩戴可以不分性别,但必须区分阶级,审美已经被权力裹挟着成为了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这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于蒙古人中,而是凡有人类的地方就有这样的情况,这篇文章是探讨蒙古族服饰审美与政治风俗关系的代表文献。

具体到头饰的艺术学研究中,代表的文章有贾玺增的《罽罽珠冠高尺五,暖风轻袅鸱鸡翎——蒙元时期的罽罽冠》<sup>[22]</sup>,以艺术设计学的视角从元代绘画、古籍资料的梳理中对罽罽冠的造型结构、材料装饰、佩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及论述,并绘制了线描图,更直观地展现了罽罽冠的结构,并对罽罽冠的变迁进行梳理进而总结出特征。车玲的《以图像为主要材料的蒙元服饰研究》以设计艺术学的学科视角,分析了在元代卷轴画、墓室壁画、雕塑和出土文物中关于元代蒙古族服饰的图像材料,使用的具体材料主要有《元世祖出猎图》、元代宫廷绘画、莫高窟及榆林窟的壁画内容,并进行了榆林窟第三窟蒙古族供养人服饰复原,切实地再现了蒙古族服饰的形制,从实践

的角度感受了工艺。

关于形制审美的研究,除了有服饰、头饰的专门研究之外,更多的研究者将眼光投射在蒙古族图案上,例如蒙古国学者宝力达的《蒙古民间图案》、国内学者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图案》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图案的形制和构成形式,并辅以图片进行了说明,属于资料型文献。在图案方面展开研究的有黄雪寅的《13-14世纪蒙古族衣冠服饰的图案艺术》<sup>[23]</sup>,对于出土文物中蒙古汗国时期服饰上的纹样进行了描述,对元代石雕上的图案进行了提取分析,总结出蒙古族图案的形成原因:一方面是吸收前代北方民族文化,另一方面是中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涵化。乌兰托亚、海日汗的《蒙古族图案结构原型之分析——兼论蒙古族图案的构成方法》<sup>[24]</sup>对蒙古族图案的统一风格进行了总结,即以“乌嘎拉吉”(盘羊大角状圆弧形纹样)结构为核心,产生的裂变与延展,认为那种无所不在的镜像式展开的圆弧形卷曲、旋转的形式结构,常常超然于图形之外,却又整体地蕴含在所有图案之中。

英国的 Krystyna Chabros 女士在刊登于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的《蒙古装饰艺术与蒙古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关系》<sup>[25]</sup>中,对蒙古装饰艺术的源流、形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描述,并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总结了宗教信仰在装饰艺术中的力量,最具特点的是她将蒙古诗歌中的“对应”与图案中的“对称”进行了联系,用来证明这种“对称”的图案是蒙古族自己产生的,而非完全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该文章是研究蒙古族装饰文化的重要参考。Krystyna Chabros 分别在 1988 年和 1989 年两次去蒙古国的喀尔喀(Khalkha)和两个卫拉特(Oriat)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并且发表了关于蒙古刺绣的术语表翻译等相关文章<sup>[26]</sup>,根据田野调查对蒙古刺绣专业术语进行了翻译。

### 2.4 工艺方法研究

饰品作为毋庸置疑的人造物,从出现那一刻起就是人工技艺的产物,因此饰品与技艺是伴生关系。人类通过技艺更深刻地了解物,物通过技艺更深入地走近人类,可以说技艺是物与人之间的桥梁。对于技艺的研究,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经历了“祛魅”与“复魅”<sup>[27]</sup>的过程,胡塞尔的现象学把科学、技术和身体重新从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操控”之下“解放”出来<sup>[28]</sup>,还原其在存在中的本质。在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中,“一切技术都是‘身体的技术’”<sup>[29]</sup>。马塞尔·莫斯等学者认识到技艺的社会功能,并借助“传统”的概念来证明技艺创造和维系的社会关系。他们认为技艺是传统的,因为它们是被传授的,被习得的,是相互传递的。其本质是实践的,这种实践同样是社会的。他进一步认为,传统技术行为既有象征性,也有身体性的效用,至此,莫斯等人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身体本身<sup>[30]</sup>。这呼应了现象学的理论,技艺与身体、行为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研究对象。

国内关于蒙古族头饰的材料和制作工艺方面的研究,在头饰研究的文章中有一部分会有所谈及技艺,但单独研究工艺的论文相对较少,与之相比,调查报告略多一些。徐英在科尔沁地区开展了详实的田野调查工作,撰写了《科尔沁蒙古族民间刺绣工艺的田野调查——以“蒙古族服饰”传承人为调查对象》《科尔沁蒙古族金银饰品制作的田野调查》。通过对科尔沁草原上著名的金银首饰制作大师莫德老师傅和他的徒弟朝古拉师傅的调查采访,关注材料、款式造型、制作工艺具体内容,并总结了所获启示,其研究成果是对蒙古族民间工艺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参考。屈指的《察哈尔蒙古部女性头饰艺术研究》主要提到了对察哈尔部女性头饰的工艺调查,访谈对象是内蒙古工艺美术大师斯庆巴特师傅和宝力德师傅,从师傅的描述与作品中再现了察哈尔部头饰特色。此类研究还有李迪《呼和浩特市银饰制作工艺调查——以鄂尔多斯头饰为例》、赤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蒙古族首饰作坊考察报告》。达妮莎的博士论文《清代蒙古族民间手工艺文化研究》<sup>[31]</sup>主要是从手工艺传承、工艺技术等方面对清代蒙古族传统首饰制作工艺进行了分析,对清代不同时期的蒙古族民间手工艺的生产、销售、思想观念等方面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她的另一篇研究论文《18世纪至鸦片战争前归化城的蒙古族民间手工艺》探讨了内地汉族“雁行”手艺人对于蒙古民间手工艺情况的影响,以及旅蒙商贸对手工行业的促进<sup>[32]</sup>,主要是梳理分析了蒙古手工技艺的外在影响因素,为观察头饰技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更为全面地考究了蒙古族首饰技艺发展中外来文化及外来技艺的影响。张季平的《技术是一种文化》以时间为主线,梳理蒙古族袍服技术的发展历程,分别描述了制作蒙古族袍服的各项手工艺技术,揭示了在其中的蒙古族文化意义,文章试图以技术是一种文化的特定视角来看待蒙古族袍服技术。除了学者,手工艺传承人也为技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扎鲁特旗的斯日吉玛老人将她所有的经验及搜集的刺绣花样整理后出版为《扎鲁特蒙古族服饰刺绣工艺》,此书中记录了大量扎鲁特纹样,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补充。她还花费了四年时间写作并出版了《扎鲁特蒙古族缝纫技艺》,确保了技艺的传承和推广。

国外对首饰技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伊朗相关文献的梳理,这是由于波斯银饰制作技术与饰品审美风格对蒙古族手工艺的影响颇深,如蒙古传统技艺中最具特色的锤揲工艺,一方面它是延续北方草原及中原地区的技艺特色,另一方面它也受到了波斯金属工艺传入的影响,融会贯通后形成的蒙镶技艺中最基础的技艺。另一种蒙镶技艺——篆刻也在波斯的手工艺品上较为常见。两地除了在技艺上相互影响之外,在审美风格上也彼此有交流,蒙古人征服波斯后,塞尔

柱王朝的折檐冠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青睐。蒙古人把这种冠帽作为尊贵的象征保留下来,从而影响了后来的帽冠形式<sup>[33]</sup>。伊朗的相关文献不多,其中 Mirjafari H., Seyed Bonakdar S.M.撰写的 *Jewels and Gold in the Art of Jewelry-Making During the Safavid Period* 中使用文献研究法,对沙法维王朝的宝石及其工艺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加深了对伊朗传统珠宝的了解。Henri Stierlin 编撰的 *Persian Art and Architecture* <sup>[34]</sup>充分介绍了波斯纹样的繁复华丽,无所不在的图案,由藤蔓与书法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波斯所特有的艺术风格,在现代蒙古族银饰技艺中的掐丝工艺中能够看到这种蔓延的藤蔓纹样的影子。

## 2.5 整理汇编画册

由于头饰研究的特殊性,近年来出版的蒙古族服饰图册是研究蒙古族头饰的可贵资料,为研究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参考依据。2014年6月出版的《内蒙古蒙古族传统服饰典型样式》上下册由乔玉光编撰,该书是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重点项目之一。自2009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蒙古族服饰的抢救保护工程,最终确定了蒙古族二十八个部落传统服饰的基本样式,并恢复制作了一批蒙古族传统服饰和头饰。该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具有参考标准的意义。《蒙古族服饰图鉴》由内蒙古腾格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著,于2007年出版,其内容包括了国内外蒙古族服饰的图片整理,将绘画与照片结合,对蒙古族的服饰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中国蒙古族服饰》于2014年3月由内蒙古出版集团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纵跨唐、元、明、清至现代,由五千四百多张图片(其中历史老照片五百多张)构成,并附带二十八个部落三十八种头饰的梳戴方法。《蒙古民族服饰文化》由苏婷玲、陈红编著,为刘兆和主编的蒙古民族文物图典系列中的一部分,全书收集了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东、中、西部八个部落的蒙古族男女典型服饰。其中每个部落服饰均包括女子头饰、帽子、长袍、坎肩、裤子、靴子和饰品等内容,图文并茂,展现各部族的服饰特点及部族服饰间的共通之处。

虽然蒙古国有很多关于服饰与头饰研究的文章与图册,但是译成英译本的较少。其中,蒙古国服饰研究院编著的 *Mongolia Costume* 是国内能够查阅到的不多的蒙古国出版的英文资料之一,以蒙古国现有女性民族服饰的拍摄为主要资料,并标注部落名称,其服饰既有民族特色,又有较强的时尚感,是了解蒙古国蒙古传统服饰的参考。1983年,H.兹纳伯尔的《蒙古珠宝》在波兰华沙出版,此书提供了国内比较罕见的蒙古族珠宝首饰的图片资料。

## 3 结语

分析发现,现有头饰研究多集中在历史考证、造

型述介、审美解读等方面,对产生头饰的民俗生活的语境相对忽视。国外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蒙古国、北欧部分国家,虽然其中不乏精彩之作,但仍缺少对于在地生活的关注。综上所述,针对头饰外观、材料及审美的研究已经告一段落了,下一步应该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一是重视田野资料的搜集,因为头饰既是民俗遗留物,又有其现代性,所有以架构的资料系统为基础,用田野资料来激活沉睡的历史资料,从而使历史纪录与真实的、民众的社会和生活发生确切的联系,使历史资料在田野资料的补充和印证之中变得丰富和明确。同时,应该用历史资料来验证个人口述的田野资料,使田野资料在历史资料的补充下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和深化<sup>[35]</sup>,力求研究的全面与整体。二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思考将蒙古族女性头饰置于本族群中女性群体的结构关系中,遵循个案研究中以小见大的特性,一方面可以探讨族群语境下的民艺文本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是如何产生实际作用,又如何与其他文本形式共同构成族群文化体系。另一方面,关注与头饰之物相关的所有人的行为及特征,关注个人在物品中融入的思想、人们赋予物品的涵义,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象征性和实际使用物品的方式<sup>[36]</sup>。实现由物及人的研究,将工艺文化研究落地化、在地化。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是不能将偶然性范畴的社会拔高到普遍性的范畴中,并进行想当然的解读,人们必须在建构性地把握对象的同时,发展出理论上的路径<sup>[37]</sup>。

####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FOUCAULT M.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XIE Qiang, MA Yue, Translate. Beijing: Sanlian Bookstore, 2007.
- [2] 李溪. 内外之间: 屏风意义的唐宋转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LI Xi. Inside and Outs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Sense of Screen[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GEERTZ C. Cultural Interpretation[M]. Han Li, Translate.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 [4] E. H. 贡布里希. 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M]. 杨思梁, 徐一维, 范景中, 译.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5.  
GOMBRICH E H. Sense of Order: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Decorative Art[M]. YANG Si-liang, XU Yi-wei, FAN Jing-zhong, Translate. Nanning: Guangxi Art Press, 2015.
- [5] 苏日娜. 罽罽冠形制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3): 103-107.  
SU Ri-na. A Study on the Shape of the Crown[J]. 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2(3): 103-107.
- [6] BOYER M. Mongol Jewelry[M]. London/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Rhodo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Art Publishers, 1993.
- [7] 金海, 齐木得道尔吉, 胡日查, 等. 清代蒙古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JIN Hai, QI Mu-derdaorji, HU Ri-cha, et al. Mongolian Chronicles of the Qing Dynasty[M].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8] 金启琮. 故姑考[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5(2): 38-42.  
JIN Qi-cong. Gukao[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1995(2): 38-42
- [9] 方龄贵. 罽罽考述[J]. 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 1989(5): 55-61.  
FANG Ling-gui. A Study of the Kwu and Kwu[J]. Social Sciences in Inner Mongolia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Edition), 1989(5): 55-61.
- [10] 阿满. 蒙族妇女“顾姑”冠文化溯源[J]. 阴山学刊, 1988(2).  
A Man. The Origin of Mongolian Women's "Gu Gu" Crown Culture[J]. Yinshan Journal, 1988(2)
- [11] 苏日娜. 蒙元时期蒙古人的袍服与靴子—蒙元时期蒙古族服饰研究之二[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0(3): 101-106.  
SU Ri-na. The Robes and Boots of Mongolians in the Mongol Yuan Period: The Second Study of Mongolian Costume in the Mongol Yuan Period[J]. Heilongjiang Ethnic Series, 2000(3): 101-106.
- [12] 金申. 从美岱召壁画看元明以来的蒙古族服饰[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84(2): 116-120.  
JIN Shen. Mongolian Costumes Since Yuan and Ming Dynasty from the Murals of Meidaizhao[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1984 (2): 116-120.
- [13] 敖其. 蒙古族妇女服饰之特征[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S1): 87-89.  
AO Qi. Characteristics of Mongolian Women's Clothing[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2(S1): 87-89.
- [14] 季洪玉. 介绍《蒙古的古代艺术》一书[J].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85(1): 74.  
JI Hong-yu.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Art of Mongolia[J]. Mongolian Information and Information, 1985(1): 74.
- [15] A·捷列季耶夫, 卢纪雨. 《蒙古艺术史》简介[J].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88(1): 43-44.  
ТЕРЕДИЕВ А, LU Ji-yu.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Mongolian Art[J]. Mongolian Studies Information, 1988 (1): 43-44.
- [16] 苏婷玲. 清代乌拉特蒙古族妇女头饰调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1(2): 80-84.  
SU Ting-ling. Investigation on the Headdress of Mongolian Women in Wulat in the Qing Dynasty[J]. Ar-

- chaeology of Inner Mongolia, 2001(2): 80-84.
- [17] 包春雨. 试论科尔沁蒙古族头饰艺术[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08.  
BAO Chun-yu. On the Headdress Art of Horqin Mongolians[D]. Beijing: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8.
- [18] 亨宁·哈士伦. 蒙古的人和神[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HASLAN H. Man and God in Mongolia[M]. Urumqi: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19] Д. 杜玛, 斯林格. 丹麦保存的蒙古文化遗产[J]. 蒙古学信息, 1997(3): 47-49.  
DUMA Д, SLINGER. Mongolian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ed in Denmark[J]. Mongolian Information, 1997(3): 47-49.
- [20] 苏日娜, 李洁. 游牧文明视域下蒙古族服饰的重复审美意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 40(11): 27-32.  
SU Ri-na, LI Jie. The repeate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Mongolian Costu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madic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0(11): 27-32.
- [21] 赵旭东. 侈糜、奢华与支配——围绕十三世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与政治风俗的札记[J]. 民俗研究, 2010(2): 22-51.  
ZHAO Xu-dong. Extravagance, Luxury and Domination: Notes on the Clothing Preferences and Political Customs of Mongolian Nomadic Empire in the 13th Century[J]. Folklore Research, 2010 (2): 22-51
- [22] 贾玺增. 罽罽珠冠高尺五,暖风轻袅鸩鸡翎——蒙元时期的罽罽冠[J]. 紫禁城, 2011(7): 80-95.  
JIA Xi-zeng. The Crown of the Kwu Bead is Five Feet High, and the Warm Wind Gently Curls Up the Chicken Feathers: The Crown of the Kwu in the Yuan Dynasty[J]. Forbidden City, 2011(7): 80-95.
- [23] 黄雪寅. 13-14世纪蒙古族衣冠服饰的图案艺术[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9(2): 64-73.  
HUANG Xue-yin. The Pattern Art of Mongolian Clothing in the 13th to 14th Century[J]. Archaeology of Inner Mongolia, 1999(2): 64-73.
- [24] 乌兰托亚, 海日汗. 蒙古族图案结构原型之分析——兼论蒙古族图案的构成方法[J]. 艺术探索, 2011, 25(6): 43-48.  
ULANTOYA, HAI Ri-han. 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Prototype of Mongolian Pattern: Also on the Composition Method of Mongolian Pattern[J]. Art Exploration, 2011, 25(6): 43-48.
- [25] 克里斯蒂娜·查伯罗斯, 陈一鸣. 蒙古装饰艺术与蒙古传统文化诸方面的关系[J]. 蒙古学信息, 1998(2): 47-53.  
CHABERROTH C, CHEN Yi-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Decorative Art and Mongolian Traditional Culture[J]. Mongolian Information, 1998(2): 47-53.
- [26] CHABROS K, BATČULUUN L. Mongol Examples of Proto-Weaving[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93(37): 20-32.
- [27] 杨大春. 梅洛-庞蒂哲学的复魅之旅[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6): 26-30.  
YANG Da-chun. The Reenchantment of Merlot Ponty Philosophy[J].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2008(6): 26-30.
- [28] 李清华. 技术与身体:设计史叙事的两个重要维度[J]. 创意与设计, 2012(6): 50-60.  
LI Qing-hua. Technology and Body: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Design History Narrative[J]. Creativity and Design, 2012(6): 50-60.
- [29] 莫里斯·梅洛-庞蒂. 眼与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MERLOT-PONTY M. Eyes and Hearts[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7.
- [30] 马塞尔·莫斯, 爱弥尔·涂尔干, 亨利·于贝尔.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0.  
MOSS M, DURKHEIM E, YUBEL H. On Technology, Technology and Civilization[M]. Beijing: World Book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31] 达妮莎. 清代蒙古族民间手工艺文化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08.  
DA Ni-za. Study on Mongolian Folk Handicraft Culture in Qing Dynasty[D]. Suzhou: Soochow University, 2008.
- [32] 达妮莎. 18世纪至鸦片战争前归化城的蒙古族民间手工艺[J].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 2008, 28(5): 32-34.  
DA Ni-za. Mongolian Folk Handicraft from 18th Century to the City of Naturalization Before the Opium War[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Engineering Edition), 2008, 28(5): 32-34.
- [33] 仇泰格. 明代金银首饰研究[D].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4.  
QIU Tai-ge. Research on Gold and Silver Jewelry in Ming Dynasty[D].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4.
- [34] STIERLIN H. Persian Art and Architecture[M].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3.
- [35] 朱霞. 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ZHU Xia. Research on Salt Production Folk Custom in Nuodeng Well, Yunnan[M].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36] 迈克尔·欧文·琼斯, 游自荧. 手工艺·历史·文化·行为: 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民间艺术和技术[J]. 民间文化论坛, 2005(5): 78-89.  
JONES M O, YOU Zi-ying. Handicraft, History, Culture and Behavior: How to Study Folk Art and Technology[J]. Folk Culture Forum, 2005(5): 78-89.
- [37] 赫尔曼·鲍辛格.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M]. 吴秀杰, 译.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BAUSCHINGER H. Enlightenment of Daily Life[M]. WU Xiu-jie, Translate. Nanning: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